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三重逻辑

池忠军

摘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消除直接影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各种误解以提升工作成效,有必要从何谓、为何、何为的“三重”逻辑来匡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何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这是一个理论逻辑问题。从哲学的观点看,一体化的关键是要有“体”,而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制度化安排,就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体”。为何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这一命题不是现在才有的。1979年是提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元年,因此,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历史逻辑的参照。从现实逻辑看,何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需要正本清源,准确定位,防止跑偏,以求实效。

关键词: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合理衔接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24)03-0001-1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统筹安排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构想,并在以“加强和改进”为主基调的逻辑上进行了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一体化”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作为塑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大战略进行精心部署。2024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各级各类学校要自觉担起主体责任,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①这是继“3·18”讲话后再一次强化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主体责任和方向。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方兴未艾。从纵向的学段贯通与横向的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关系上看,一体化可以简化为“纵向衔接,横向协同”八个字(本文主要讨论纵向衔接问题)。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若干看法,诸如各学段各有其特点,如果一体化,需要设置各学段课程之外的专门“一体化”课程,或者大中小学同上一门课,抑或某些专题课程一体化或活动一体化;在纵向衔接的讨论中侧重于如何打通“堵点”,消除“痛点”,或者认为“一体化”还不是“系统化”,需要在认知逻辑上有从一体化到系统化的转变过程;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中也存在“我讲我的课又怎样去做一体化呢”或“一体化与我有何关系”的认识。实际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何谓一体化”“为何一体化”“何为一体化”,这也是关于“一体化”的认识论问题。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2022SJZDWT002);中国矿业大学教学学术研究重大课题(2022ZDKT06)

收稿日期:2024-05-24

作者简介:池忠军,男,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治理理论。

^①《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丁薛祥出席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并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5月12日,第1版。

一、何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何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这是一个理论命题,需要从理论逻辑上来回答。“一体化”本身是事物概念化的一种认知,也是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常用的概念。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近似的阐释:一体是部分的整体性关系,但从整体出发和从肢体出发可区分出两种道路,即理性的演绎和经验的表象。康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创立了先验综合辩证法,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认识论实现人对自然界的整体和部分、现象和本质的认识。从工程学领域来理解一体化更为直接。在直观经验上,各个零部件分别加工再组装成一体机器,这就是一体化,但是能够把部件组装成一个整体,是因为各部件的作用和运行机制早已存在于整体设计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参照恩格斯所说的,18世纪重要的机器发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使用机械动力,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②,原理才是机器一体化的根源。这种一体化从原理所把握的整体出发,以整体性机能分配到各个肢体或部分,经过精密加工再组装成整体,各个肢体协同运转从而实现整体机能。机器体的一体化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不同,但可以比较。因为一体化都有“体”的理念或实在,如果没有“体”也就不会有对“一体化”的追求。

从本体论哲学来看,整体的关键是“体”,“体”是事物的根本、本体、本质、主体或内在规定性。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对“体”的问题讨论最多,在他看来,“一体”就是整体、全体或整全。但把握整体有两种路径,在感觉的经验现象层面,有生命的个体既是主体又是有目的的活动主体,人是自然界中具有最高等级灵魂的生命体,人的目的是至善而生存。这里的善有三重意涵:首先是价值属性的好或不好;^③其次是情感(家庭生活的)、友善(朋友、伙伴)关系;最后是合理选择的“中道”。从前两个层次看,个人、家庭、伙伴群体都各自取向自我理解的善,这就是善的“多”。由“多”可否至“一”呢?如果对“多”进行归纳,就会出现海德格尔所批评的由存在者到存在者的集合的谬误,这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概念既不是算数的平均也不是归纳、抽象,而是规范人们生活的价值指向。这种价值指向来自哪里?对此,亚里士多德从感觉的经验现象回到世界的本体,即理性(Nous,直译努斯)统治世界。^④理性作为世界的本体和主体,是不动的动者,现象世界由其派生并受其支配。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整体类似于人的身体,其包含各个肢体,从肢体出发得不出整体,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规范各个肢体。^⑤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上看,“一体”似乎是累赘的表述,因为“一”就是“体”。但从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上看就不是赘语,因为内在“体”的自在自为性派生和支配了外在的“体”——城邦制度。由城邦制度作为整体来支配各个组织体是合理的,但仅仅将各个肢体进行整合以达至整体则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体用学说。“体”和“用”不可分割,“体”是事物性质的规定性和外显形体,“用”是实现体的活动。“体”和“用”作为一对特有的哲学范畴,在先秦的早期哲学中已经出现,但未作特殊强调,唐宋至明清之际把体理解为“本”或“本根”和“本体”,“本体”也就是“实体”。^⑥宋代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③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下》(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1页。

^④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0页。

^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政治学》所讨论的理性作为整体、整全、全体都与身体的整体性相类比,但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表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之体与派生之体关系的论说。

^⑥参见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二程理学回溯《易传》《论语》等典籍确认体用都是实体,形成体用同源说。朱熹理学是体用说的集大成,建构了理为体和象为用的关系,认为“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①。在这一基础上建构理与仁的关系,仁本身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据此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就有了内在的理与外在人伦关系的体制机制之分,因理与仁相同,所以以仁为首位的在世规则认为“仁对义、礼、智言之,则为体;专言之,则兼体、用”^②或者“若独说仁,则义、礼、智皆在其中,自兼体用言之”^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化”早期指人的变化、教化、育化,后也指自然界的万物生息。总体来说,“化”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但“化”主要指向人的育化,尤其是在世、处事的化之方向性规定就是“仁”,这包括个体的人和制度化的体制机制。因此,“一体化”就是以内在之理化育外在之体及人的过程。

可以说,朱熹的“理”和“象”的关系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和在世的理念近似。从社会制度来说,其内在的无形的本体派生出外在的有形的体制机制,后者符合前者,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在清除唯心主义本体玄学的假象后,其对社会制度的存在形式的认识也有可借鉴之处。

马克思在哲学上没有专门讨论本体论,但其无论是作为研究者或是继承人都试图挖掘出本体论,诸如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劳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关系本体,等等。这些界说很难取得共识。实际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当是“规律”,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本体,但自然界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以物理规律变化着的实体和主体。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社会是以人们为了生活而创造生活的规律发展着的历史来呈现的。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在人的活动和属人的精神之外去寻找精神本体的谬误,把符合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与合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统一起来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也就是“体”。

从唯物史观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本体之“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作为以化育人的制度完善之目标而来的,因此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肢体部分。从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重要制度的属性,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我国教育制度的顶层,更是思政课的核心。

马克思关于“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④的重要论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制度构建与完善的根本遵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念可以称为教育的内在制度,作为具体的教育的体制机制可以称为外在制度,外在制度由内在制度转化而成。制度是人设计的,但人不能以任意的想象来设计,制度和机器、机器体系的可比较性就在于其总是由原理转化为形体及其运转的。人类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⑤社会这一有机体的变化是人们相互作用关系的转变,也是社会制度的动态性存在。从制度原理上看,制度总是基于原则和体制、机制来型构。体制是制度的有形架构,由组织机构的纵横结构构成。社会科学的机制概念源于机械或机器体系运动机理,也是运动的动力和动能系统,具有“力”的含义,从社会关系来看机制就是社会矛盾运动。社会作为人们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其自在自为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了经济基础与政治的、法律的上层

①朱熹:《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41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建筑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的整体关系,即整体的国家制度。这也充分说明国家制度是矛盾体形式。在社会自在自为的矛盾运行中还有外在力量的植入,这种力量也是作为动力而出现的,如改革、创新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有效解决矛盾的动力。从唯物史观上看,社会机制或国家机制就是矛盾运动形式的动力系统,其原则内化于或渗透于体制和机制之中。原则是由理念转变成现实法则的,体制机制是为实现理念、解决矛盾而设定的。从静态上看,总体的体制为实现理念而设定,但又由各个分支机构所构成,这些分支机构能否整合为整体并有效运行,这需要从动态上看机制的作用。具体的机制是体制运动的动力系统,是人的活动和发挥人的能力的体系,与机械动力系统相区别。但是,人的活动和能力发挥总是在具体的组织机构中,也就是说,动能存在于体制中的各个组织机构。理想的状态是各组织机构运行整合成整体,发挥制度的整体效能;而非理想状态有多种变式,诸如机构冲突、赋能不合理、具体机构运行良好而整体不畅、人不能承担应有的能力要求或未尽尽职尽责,等等。正因如此,体制机制变革成为正常现象,原则规定了变革方向,同时也规范了选择方法的范围。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体”从属于整体的教育体制机制,它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理论向制度的转化。按学段设置各类课程是人才培养规律的要求,思政课的关键就在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特殊之体。这个“体”是思政课的原则,它内化于各学段思政课的体制机制之中,同时也是以实践成效检验体制机制合理性的尺度。因各学段都有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思政课也在其中,这就出现了各学段思政课相互衔接的问题。基于此,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就是“将多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逐步在同一体系下‘化为’彼此包容、有机融合、相互配合的共同体的过程。”^①这是从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上来说的。从总体上看,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贯穿于各学段思政课的始终,其作为刚性原则规定了体制机制须与其相符合。所以说,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取向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体,也是为解决体制机制矛盾而进行变革的根本遵循。

二、为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作出了阐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②和“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③,同时也指出“这些年来,思政课建设成效是显著的,教学方法不断创新,教师乐教善教、潜心育人,教师队伍规模和素质稳步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初显成效。”^④肯定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初显成效是多年努力的结果。

为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构的历史逻辑上看,就是以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红线,统筹考虑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制度化安排和实现合理衔接的问题。从这一路径上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化”既是过程也是人的成长化育的代际连续性。虽然整体性安排大中小学思政课之初并未用“一体化”概念,而是用“衔接”

①卢黎歌、耶旭妍:《规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必然遵循》,《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0-12页。

②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第4页。

③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第6页。

④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第7页。

“整体规划”或“统筹”,但其实质上都是一体化的表述,统筹作为辩证法概念和一体化一致。

思政课一体化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79年,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的调研报告中就如何解决大学阶段的党史课与中学的历史课过多重复的问题征求各方意见,形成了“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如何分工衔接”的问题意识。^①同年,教育部转发《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在小学开设思政课和教材建设的要求。^②由此可知,1979年是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相互衔接的元年。

“85方案”是规范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重要阶段。1981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在改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从小抓起,在少年儿童时期就为培养优良的思想品德打好基础。在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要结合学生年龄的特点,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相互衔接,循序渐进。”^③而后,自1982年开始的对小学到大学的思政课学段铺陈效果明显。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发[1985]18号,以下简称“85方案”)明确指出,“必须紧密联系青少年不同时期的思想、知识、心理发展的特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引导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积极地思考并回答自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认清和履行我国青年一代的崇高责任。”^④由此形成了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中学开设思想政治课、高校开设“两课”和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85方案”主要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规范了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思政课循序渐进的学段分工和有序联系的进阶性程序;其二,明确提出了小学阶段思想品德课要与语文、历史、艺术课和课外活动相配合,这是后来形成的德育课与学科德育横向协同以及现在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课程思政相协同的基础;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结合起来。

1988年是实施“85方案”的关键之年。其源于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把学生成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结合起来,构建各学段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全覆盖。二是对小学德育的认识取得共识,更加注重养成教育,使德育与生活紧密联系,在德育研究领域将生活德育或德育生活化作为德育课程的重要取向。将小学德育纳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职责范围的做法有效解决了小学德育无人监管的问题。1988年12月,中共中央为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从战略高度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机制,确定中小学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⑤三是总结大中小学思政课相衔接所取得的成就。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在总结经验时指出,“努力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逐步形成了大中小学相衔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配合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德育新格局。”^⑥

“98方案”是对一体化建构的改进和提升。大部分人认为“98方案”是高校的思政课改革,实则大中小学整体性改革方案。从改革的上位指导思想来看,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改革的新指向之一是“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要遵循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85-489页。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94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38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2页。

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28-734页。

⑥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910页。

目标,科学地规划各教育阶段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各种教育内容的深浅和侧重点,要针对不同年龄及学习阶段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所不同,逐步提高”^①。以此为指导,1998年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并深化了各学段课程改革的力度,出台了各学段的课程改革整体方案。首先,国家教委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其次,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最后,中宣部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由此,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进入整体规划的新阶段。

“05方案”突出了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整体性顶层设计。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两份重要文件^②,依据文件精神,2005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强调“合理确定课程的设置及课程标准,是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工作的重点。教育部将不断优化各级各类学校德育课程的设置,并制定德育课程标准,明确教育目标、内容及要求,使小学、中学、大学各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形成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循环上升、有机统一的体系”^③。同时,成立整体规划大中小学思政课的领导小组、专家指导委员会和教材编委员会等。

“05方案”的实行加大了统筹协调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力度。中小学德育和政治教育课程内容以完善课程标准为抓手取得明显进步,高校教材、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管理体制建设等均取得显著成效。2015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17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和本科《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3·18”讲话中肯定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这既是对自1979年以来积极探索的肯定,也开启了“一体化”推进的新篇章。

2020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思政课“20方案”确定了各阶段的培养目标:小学阶段注重培养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筑牢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质、大学阶段重在培养使命担当的精神。围绕目标的连续性、进阶性整体规划课程目标、调整创新课程体系、统筹推进课程内容建设、加强教材体系建设等。^④

为何使各学段思政课一体化?通过反思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可知,一体化之“体”就是贯穿始终的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念内核,主题是“加强和改进”,实施途径是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从理念之体到具体实施理念的体制机制,思政课必然在各学段的体制机制之中,因此说思政课一体化既要解决目标、课程、内容、教材、师资、教学方法等问题,还要解决各学段的体制机制问题,只解决一个方面不可能实现一体化。

三、何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何为思政课一体化,即怎样做的问题。从现实逻辑上看,正本清源是正确思考何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关键。首先,一体化既不是对碎片化的存在形式进行组合,也不是齐一化。在各学段课程设置、内容安排和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基础上,巩固和提升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30-837页。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2月26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8月26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77-1183页。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29-1536页。

务。其次,一体化不是既有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外的“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最后,思政课一体化不是在各学段思政课之外另实施一套“一体化课程”。明确认识到什么不是一体化,对区分思政课一体化的“何所为”和“何所不为”的具体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统筹规划各学段的思政课课程设置

各学段课程设置的“一体化”概念是“统筹”的意思。统筹即尊重学段差异性的有机统一。各学段思政课课程设置的差异化是按一体化的统筹安排进行的,统一性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统一是整体性规划课程,既不是各学段、各地、各校各行其是,也不是齐一化;其二,在统一设置各学段思政课课程的前提下,在实施过程和效果上达到统一。显然,这两个统一还未实现。

首先,“20方案”规范了大中小学思政课的统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阶段分置上,小学到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设置“道德与法治课”,高中阶段设置“政治课”,大学阶段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考虑到初升高的分流,设置了与高中阶段并列的“中职”学校的思政课,安排专门的职业道德、职业规划、职业精神、工匠精神等内容;考虑到高中生有进入大学本科和高职类的分流,又设置了高职类的思政课。总体而言,统筹规划思政课设置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在课程设置的理论上仍存在偏差,在实施上也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其次,在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贯通大中小学的通用名称中出现了将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向高中和义务教育延伸的误解,这一误解又引发了关于道德与法治课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误解。有学者对此误解做出了纠偏: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重在养成,狭义的德育限于道德塑造,而思政课的德育是广义的,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道德与法治课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遵循了人的成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①思政课是讲道理的课,从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想品德养成到高中阶段的政治核心素养,再到大学阶段侧重于学理和哲理的逻辑,“是顺流而不可倒灌”。从课程设置的统筹逻辑上看,各学段要完成的培养目标是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规定的合理分解,而后,通过实现各阶段培养目标的课程结构来完成,但课程设置的规范能否在各阶段得到切实执行?这是制约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最后,从发展逻辑上看,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设置还存在依据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时间。一方面要认真执行课程设置规范,另一方面,既要考虑学段的衔接问题,也要考虑同一学段的课程设置的合理化问题,尤其是高中和大学两个阶段各门思政课之间的关系。

(二) 统筹教材建设

1979年,在提出大中小学思政课相衔接要求的同时,提出了小学与中学、中学与高校教材统一编写的要求,但这只是先统一大纲前提下各自编写教材的探索方案。“85方案”明确指出,“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并设置相应的办事机构,统筹规划课程设置、教材编辑及审定,教学参考资料的研究和进行其他组织工作。”^②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教材研究中心,由于课程改革任务繁重,于是采取先统一大纲从而规范多部门编写教材的做法,由此,教材建设从“多纲多本”向“一纲多本”转变,为鼓励编出好教材采取了竞争机制。^③1992年,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政课教材建设的管理意见明确提出了任

^①参见韩震:《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思路下的思政课建设——访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0页;冯建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内容要求与推进措施》,《课程·教材·教法》2023年第2期,第59-66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4页。

^③参见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课程·教材·教法》2019年第5期,第4-14页。

何个人和单位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编写思想政治教育类教材的要求。由国家教委思政司统筹规划教材编写和管理,负责制定指导性教学大纲、教学要点,组织编写全国通用性教材,各省和直辖市按统一大纲和教学要点组织教材编写。^①199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针对中小学德育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教科书、教材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概念太多,生动的、有说服力的、事实太少,这要改……不能把中学的课程变成大学某个理论课程的浓缩,中学政治常识不能变成大学政治学的浓缩。”^②这是在统一大纲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教材编写如何解决大中小学德育教材从多讲故事少讲概念到大学侧重讲清理论的内容衔接的问题。“05方案”为实现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内容有效衔接,“成立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审委员会,统筹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设计,统筹大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写,保证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内容的衔接。”^③“05方案”规定了由“马工程”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成员2004年成立)高校的思政课统编教材并全部落实。但在中小学还存在全国统编、省编、校本教材等多个版本。2016年,教材升格为“国家事权”,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相继成立,为统编教材的编写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而后,“20方案”的实施真正开始了各学段思政课使用统编教材的进程。

统筹教材建设是一体化的关键。但是,教材建设一体化并不是成立一个编写组包揽各学段教材的编写和审定。从反思的视域看,目前大部分人认为各学段教材编写各自为政是造成教材内容碎片化、简单重复、衔接不畅的主要因素。实质上,这方面的问题正在解决,我们应更多关注于实施“20方案”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其一,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密不可分,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密不可分,这就构成目标、课程、教材三者之间的关系,目标是导向、课程是目标的转化,教材内容是目标和课程的具体实现途径。其二,问题在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与初中的课程设置和内容的衔接以及初中与高中、高中与高校教材的阶段衔接。教材编写之难便在于学段教材内容的选择和表述方式上。

(三) 统筹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是实现教材内容的过程。近年来,高校思政课教学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内容为王,将内容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转化为学生的信仰信念和责任担当的思想行为体系。但从现实上看,对教材内容之“王”的理解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诸如质疑教材内容另成一套者有之,讲课者以自己的专业背景将教材内容拉向其他理论解释者有之;为增加趣味而游戏化戏剧化者有之;为学生评教得高分而“我讲我的你做你的”者有之,等等。从低限度来说,教学方法包括了对教材内容之“王”的准确理解和实现“两个转化”的全过程,培养目标已经渗透于教材内容之中,因此,如果不能理解教材内容也就很难理解教学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从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方法相互衔接的问题来看,也存在倒置的问题,高校教师较少关注和研究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形成重复老一套的课堂印象。

中小学的思政课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在小学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缺乏专职教师,多数由班会或其他课取而代之。在高中阶段,会因高考选择的考试科目有别而区别对待,如高考选择政治课考试科目,教师会采取知识点式的精讲精练的应试教学方法。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必须解决所面临的难题。首先,统筹教学方法改革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01-802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97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82页。

并不是大中小学的齐一化,而是应根据各学段的特点和实现教材内容的目的来选择适宜的方法。其次,在高阶段的教学方法选择上要实现内容的螺旋式上升,解决教材内容重复的问题,搞清楚“不必要的”或“简单重复”的问题和内容螺旋式上升的差别。属于内容的学段上升就不能理解为简单的重复,要通过教学的螺旋式上升予以解决。最后,高校的思政课要突破掌握前诸阶段所学内容的难题,这是由于各地中小学思政课所学内容有差别、学生理解程度参差不齐、教师对讲述内容的详略和难点把握也存在困难。因此,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如果不能突破这些难题,仅就方法而论方法也是难以奏效的。

(四)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设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设并不是齐一化。师资队伍建设的统筹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适应各学段的思政课教师,既不是大学教师去中小学做示范讲课,也不是低学段的到高学段去讲课,各学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小学教师课程研究和教学法研究强于高校,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所要克服的问题有其独特性。^①师资队伍建设的统筹的关键在于建设。建设是一项过程环节与达成目标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大中小学思政课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设是有发展规律可循的。从党中央、国务院、中宣部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政课的文件来看,几乎都涉及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设这个关键问题。为弥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不足的问题,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科,为培养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奠定基础。到目前为止,相当数量的高校按师生比1:350的比例配置专职思政课教师两位,总体上已不再紧缺。但一方面,多数高校为达到比例要求将各种专业背景的人才纳入思政课教师队伍,产生了思政课教师如何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问题,这也是一部分教师以自己的专业背景套解教材内容的原因所在。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即在大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基本满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培养的大量研究生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出现不能充实师资队伍。中小学的情况与高校有所不同,大部分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数量很少,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教师编制数不够,且由于人口的变化,基础教育数量减少,有些地区考虑把高中的专职思政课教师向低阶段调转。同时,仍存在将思政课视为副科的错误认识。因此,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必须同时解决既有的问题和出现的新问题。

(五) 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建设

大中小学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统筹,并不是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实现齐一化,但体制机制问题是关键。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而关键课程建设的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完善是通过教育体制机制来实现的,从这一意义来说,体制机制是思政课的关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目标,必然要通过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来实现,但不仅仅是学校的体制机制,还有重要的政府的体制机制,后者掌握资源配置的权能,前者则负责落实和创造性执行。从现实看,既有体制机制是整全的,人们在总结碎片化的问题时也会关涉这方面,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理念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这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在地方政府的教育领导和管理体制机制中以及在学校体制机制中是机构还是机制的问题?事实上有机构无机制、赋能不合理、机制动能不足或无机制无机制等情况都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试图越出现有学校思政课实施体制另设置一套一体化课程,忽视实体课堂教学,便会背离一体化的愿景。

目前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即已经不重视思政课一体化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实

^①参见王岩、殷文贵《思想政治教育的春天与阻碍发展的八大因素》,《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6期,第122-128页。

质上,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范围更广,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问题,不仅是对思政课的要求,更是对各级领导机构的要求。对领导机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强调无论是哪一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得到同样的重视,各学段的思政课建设都要落实主体责任,都要通过各学段的学校体制机制来实施。在纵向体制机制结构中,政策制定后,上级机构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化的关键,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和主阵地地位。从目前来看,部分小学未能真正讲授思政课,教材没有打开,即使是兼职教师也应把课程上起来,教材修订是在使用中不断完善的。思政课一体化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必然要历经从领导体制机制到学校体制机制的过程,因此,从领导主体责任到落实和执行的主体责任的链条必须明晰化,从而切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总而言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化的观念来准确理解一体化的含义和实现一体化的正确操作程序,如此才可取得实质性进展。

(责任编辑、校对:王齐玥)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CHI Zhongjun

Abstract: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all kinds of misunderstanding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from the triple logic of what, why and how. What i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This is a theoretical logic problem.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the key to integration is the body. The institutionalized arrangement of cultivating and bringing up qualifi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is the body of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Why construct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This is not a new proposition, which was already put forward in 1979 for the first tim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need to observe the historical logic. From the practical logic, how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needs to take radical reform, position accurately, and prevent devi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ctual results.

Keywords: coord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integration; reasonable connection